

村



法

李纯霜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法

CUN

YU

FA

村 与 法

李纯霜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村与法/李纯霜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5

ISBN 7-81093-090-7

I. 村… II. 李… III. 乡村—法治—研究—中国 IV. D92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2737 号

村与法

李纯霜 著

责任编辑 孟宪余 陆向军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邮编:230009	
电 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press@hfutpress.com.cn

ISBN 7-81093-090-7/D·6 定价:24.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 (代序)

徐 勇^[1] 徐增阳^[2]

根据现代化的经典理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意味着城市和乡村的中心——边缘、支配——被支配的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乡村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生存还是毁灭,衰败或是复兴,遗弃抑或重建……任何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然面对并必须解决这一“哈姆雷特”式的难题。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正是在现代化背景下提出来的一个社会改造和发展的问題。在古代,社会是乡土社会,农业是主要产业,民众主要是农民,以农耕文明为特质的均质性社会按照自身的逻辑演绎和发展。因此,在古代,农村、农业和农民并没有构成社会和政治问题。只是随着以工业文明为载体的工业、城市和工人等现代文明因素的出现,与传统农业文明密切相关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便构成了社会和政治问题。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由于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启动的,在此过程中,作为传统因子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便格外突出。自20世纪以来,在西方工业文明裹挟的大量现代因子的冲击下,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日益凸显,成为知识界和政府十分关注并致力于解决的重大问题。由此,20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研究便具有了明显的“问题导向”的特性。

20 世纪前半叶：农村的衰败与农村和农民问题

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自 19 世纪 60 年代晚清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作为现代化“弃儿”的农村和农民一直在衰败和危机中挣扎。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不仅没能遏制农村衰败、克服农村危机，反而全面激化了自晚清以来乡村社会中所凸现出的全部矛盾，酿成 20 世纪前半叶农村空前的社会与政治大动荡。日益严重的农村与农民问题，引起了当时的知识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试图寻找“医治”的良方，由此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了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在这次研究高潮中，国内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一种是出于救国救民的政治需要而研究农村和农民问题，以毛泽东和梁漱溟为代表；另一种是从学术上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并为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提供思路，以费孝通为代表。

1. 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道路”

由于现代化造成农业和农村的衰败，引起一批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梁漱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浸染，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使梁漱溟洞识到，西化道路不可能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自 19 世纪后期的自强运动以来，中国经历了一次次社会变革，领导变革的知识分子都认为通过学习西方可以使中国富强。但是，这些运动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造成无序和混乱，是农民群众而不是知识精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财富和机会集中于城市，农村一步步遭受劫掠，特别是以都市文明为载体的西方文化破坏了传统的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这一中

华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以西化为目标的现代化给中国农村造成苦难这一事实证明:一味仿效西方都市化、工业化文明无济于事,中国只能复兴“以农立国”的中华文明,知识精英只有转向受西方文明浸染较少且受西化苦难最多的乡村,才能找到中国的出路。梁漱溟认为:民族自觉的头一步,便是觉悟到乡村,从这一步,就可以觉悟到一切,觉悟到我们原来的社会构造的特殊,觉悟到我们自有我们的前途。所以,乡村建设是中华文明复兴的起点和基础。

梁漱溟之所以提出“乡村建设”,而不赞成共产党的农民革命,是基于其对中国国情的独特理解。他从文化本位出发,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人伦关系为本位,只有职业之别,而没有阶级之分,因此只有建设之任务而没有革命之对象。中国的问题虽然包含政治经济问题,但实则是近代西方文明冲击造成的文化失调问题,其出路是改良文化而不是制度革命。解决乡村问题进而解决中国问题的惟一出路是通过乡村建设复兴中华文明。乡村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依靠乡村自治,创造一种以理性和伦理为基础的新团体组织,由此推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此,在国民党地方派的支持下,他和他的同事身体力行,先是举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有志于乡村建设的知识精英,后又直接到山东省邹平县从事社会实验。可以说,乡村建设运动带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是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文化改良运动。

梁漱溟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和实践有独到性,但是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其独到性在于:一是不同意西方道路的普适性,而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梁漱溟独具慧眼地看到了以城市化、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两端弊端,即物欲横

流和乡村被遗弃,认为中国不能走西方的老路,力图以文化重建复兴乡村,进而改良中国。二是强调知识精英必须到农村去,与农民结合。其局限性在于:一是过分强调中国特殊性,从而否定现代工业文明的普适性,这必然妨碍他正确认识、分析中国乡村的根本问题;二是文化本位的分析方法忽视了农民贫困化的根源;三是将乡村居民等同于农民,无法改变农村固有的社会阶级关系,无法激起下层农民的热情和向往。梁漱溟曾为之叹息:“工作了九年的结果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梁漱溟希望造就乡村领导精英推动乡村建设运动终于流于空想。

2.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探索

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对现代化启动后农村的衰败和农民的苦难有着更为真切的感受。从青年时代起,他就致力于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使他的探索获得了正确的理论指导。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方法,毛泽东将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根源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即不合理的地权关系。因此,只有充分动员广大贫苦农民改变旧的统治秩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在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上,毛泽东创立了不同于马克思等人的独到理论。

其一,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大批破产农民被转化为城市产业工人。工人阶级是人数最多、受压迫最深的阶级,因而,工人阶级是改造旧社会,重建新制度的阶级力量。而在中国,现代化是在外部力量侵入下启动的,传统社会的主要社会成员——农民作为一个阶级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所受苦难最深重,“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

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3]。只有解决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问题,制度革命才能成功,从而成为现代化重建制度的基础。

其二,在西方现代化的经典理论看来,农民不过是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弃儿”。即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民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也估计不足。恩格斯认为:“我们的小农,正如任何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4]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党的主要领导人也认为只有城市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动力。陈独秀等人更是以城市知识精英自居,轻视和忽视农民的历史主动性。而毛泽东通过实际调查,对农民的历史主动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将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作为检验是否是革命者的标志。毛泽东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正是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5]。之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结合,才能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由此,将被视为消极存在的农民阶级提升到革命主体的地位。

其三,西方现代化的经典理论将人口、资本、技术集中的城市作为社会历史变革的中心,分散的乡村则处于边缘地位。以西方国家经验为基础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认为,革命的中心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集中居住的城市。而在毛泽东看来,

中国的城市主要是政治统治的堡垒和消费中心,中国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农村是消费品的主要生产地。为此他提出,要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在农村造就革命力量,以取得革命的成功。

其四,由于农民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农民是革命的动力,农村成为革命根据地,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和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即不合理的地权关系。只有实行“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解放农村生产力。解决土地问题的实质是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实现其物质利益,这正是农民作为历史变革动力的持久源泉。显然,它与简单地消灭私有和遏制个人利益追求的想法和做法有显著的不同,这反映了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深刻了解 and 认识。

在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上,毛泽东既注意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普适性,又能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因此他创造性地探索出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并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

为探索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出路,毛泽东十分重视实地调查。如20世纪20年代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30年代的江西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40年代主持的陕西省农村调查等等。这些调查不仅为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了直接依据,而且在调查方法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批判了梁漱溟等人的观点。主要代表有陈翰笙、薛暮桥、千家驹、孙冶方等人,他们的文章主要发表在《中国农村》杂志上,因此又被称为“中国农村派”。他们认为梁漱溟等人看到了农村问题,但没有找到农村问题的根

源,因此不可能有医治农村问题的良方。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实际从事社会调查,正确认识到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有效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正确思想,从而产生了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最辉煌成果,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3. 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的研究

20 世纪前半叶,一些学者从学术上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并为解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提供了思路。这一研究由于是纯学术研究,因此被称为“学院派”。1926 年~1927 年间,李景汉就曾指导燕京大学的学生对京郊挂甲屯等四个村 160 户家庭进行调查,并于 1929 年出版了《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1933 年,李景汉又根据自己以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调查部的同仁进行的定县调查出版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在这些研究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费孝通,其主要著作是《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1936 年出国留学前,费孝通在家乡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细致调查。出国后,在其导师——人类学功能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写出了题为《中国农民的生活——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的博士论文。这本译成中文后改称《江村经济》的著作不仅从社会学角度深入细致地描述了中国一个村庄的农民生活,而且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观点:以恢复中国农村企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

开弦弓村是一个农业加手工业的典型社区。费孝通通过调查注意到农业、家庭副业和乡村工业的关系。在他看来,农业和

手工业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时间,因而,中国农村经济具有工农相辅的内涵。现代化不能凭空而来,要在传统的底子上建设。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对中国农村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性,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复归,其结果如何,将取决于农民如何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这意味着中国的乡土重建既不能复制西方,也不能复归传统,而应在传统力量和新的动力相互作用下依靠农民自己去解决。

通过对一个村的深入调查和研究,费孝通准确地把握住农村的基本问题,认为“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6]。从这一意义上,费孝通赞成中国共产党以制度革命的方式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但他认为,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平均地权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村问题,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恢复农村企业是最根本的措施”^[7],即走乡村工业化之路。这种农村企业就是深藏于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中的“草根工业”。

回国后,费孝通与张子毅等人一起,调查了昆明滇池附近的禄村、玉村和易村,并先后写出了《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乡土重建》等以农村社会学为主题的理论著作。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深入解读了中国传统社会,认为中国是乡土性社会,乡土社会的核心是“土”,人和土地的关系构成中国的特殊性。他总的思想是,以工业重建乡土,进而解放农民,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并最终解决中国问题。改革开放后的实践证明,其思想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国外研究者的介入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20世纪前半叶,一些外国人也开

始涉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这种研究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术性研究。这主要是当时一些在中国的大学任教的西方学者，他们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对中国乡村进行的学理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1920年～1925年间，在金陵大学任农科教授的卜凯对中国7省17县2866个农场进行了为期五年的详细调查，1933年他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一书。他通过调查发现，中国的贫困在于农场面积的零细，生产力的薄弱，总根源是人口过剩，人口过密，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实行人口节制。1925年上海沪江大学的美国学者库尔普(Daniel Kulp)带领攻读社会学的学生对广东潮州凤凰村的家族进行了调查，并撰写了《南部中国的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另一类研究是为本国制定政策提供依据。从研究角度看，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费正清。费正清是个“中国通”，在中国居住过很长时间。在《美国与中国》这部书中，他将中国视为两个不同的社会，一个是都市，一个是乡村。在中国乡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中，乡绅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国家与农民的中间人，是乡村社会的实际统治者。其研究成果对美国政府从主要扶持中国中央政府转而关注地方实力派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早在1907年日本就在大连设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其主要目的是搜集中国的社会经济情报，从而为制订侵华政策提供依据。在他们看来，中国社会的主体是乡村，是农民。要真正征服中国，就必须征服中国农民，要征服中国农民，就应该了解中国农民。因此，他们将调查的重点放在对中国农村的调查上，其调查范围和内容也随着侵华范围的不断扩大而扩大，涉及中国大多数省份。主要调查方式是在中国不同地区抽样调查村庄，包括村庄的社

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获取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据统计,目前在日本及美国的大学里保存的“满铁”调查报告和文章有10 514种之多,现已出版《中国农村惯行调查》(6卷)。关于这些资料的学术价值,国内外学术界有争议,有的认为这是日本为侵华的需要进行的,缺乏科学性;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虽然“满铁”的调查是为日本侵华服务的,但是这些资料是值得重视的,是了解和研究20世纪前半叶中国乡村社会的宝贵资料。美国著名的华裔学者黄宗智先生就认为,满铁资料不失为用现代经济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的一组数量最大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资料。它们的质量,甚至可能高于20世纪前半叶世界任何其他小农社会的有关资料。现在国内外有不少学者正在利用这些资料对20世纪前半叶中国乡村社会进行研究,有的成果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当前国际上影响很大的杜赞奇的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年~1942年的华北农村》就是利用“满铁”在华北调查的几个村的资料写作的;朱德新也利用“满铁”在山东和河南的资料分析保甲制度,出版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1994);曹幸穗撰写的《旧中国东南农家经济研究》也是在“满铁”对江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撰写的。总之,“满铁”的调查资料是有待进一步开发利用的,是研究20世纪前半叶中国乡村的很有价值的资料。

20世纪50~70年代:国内研究的停滞与

国外研究的进展

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由于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因此,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之后,

迅速转入农村集体化,从此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认识的主线是围绕农业集体化展开的,并由此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重大分歧和争论。

土地改革后的农业集体化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增加生产,解决日益增长的人口吃饭问题;二是为工业化提供积累;三是实现大体均等,避免两极分化。集体化对中国来说的确是一场革命,因为几千年来中国的农业生产都是以户为单位,既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本位,也不同于前苏联村社集体共同生产的传统。但是,受前苏联模式的影响,我们对集体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认为集体不仅是生产资料的集合,而且是劳动的集合,以致集体的规模愈来愈大,由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一直到人民公社。由此就脱离了中国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以户为单位生产的国情和传统。先是1955年左右个别地方出现了所谓“生产力暴动”,少数农民以破坏生产工具等消极方式反抗急剧加快的农业集体化。但这种反抗是无力的,因为农民的土地是共产党领导革命胜利取得国家政权后分给农民的,加上相当多数的农民对党的号召积极响应,有要求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所以,集体化进程总的来说比较顺利,生产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特别是通过人民公社这种集中劳动和集体分配的方式,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近7000亿元的资金,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做到了大体均等。

但是,人民公社一成立,就面临着致命的弱点,即无法解决劳动管理和生产动力问题。在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下,受“不劳动不得食”的铁的规律支配,人们自觉劳动。进入集体以后,许多人共同劳动,劳动态度和贡献有所差别,但这种差别

却难以通过报酬体现出来。由于报酬的平均化和科层制管理，势必出现集体性偷懒和少数人占便宜现象，从而影响生产的持续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率先提出“集体劳动必须包工包产”的责任制主张，1957年浙江省永嘉县兴起“包产到户”。由于反右，这一试验受到激烈批判而中止，直到1959年～1961年，加之天灾，全国出现大量农民非正常死亡，才引起我们党对农村政策的深刻反思和高度重视。为此出现两种不同的思路。

一是包产到户的探索。由于粮食生产和供应的日益紧张，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并得到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

二是坚持人民公社体制。毛泽东起初支持包产到户，但他的基本思路是坚持人民公社体制。他认为人民公社的主要问题是“一平二调”，核算单位太大，主张通过调整，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和报酬脱节的问题。随着党内愈来愈多的人赞成和支持包产到户，特别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由过去坚决反对到支持包产到户，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认为这与人民公社体现的平等理想背道而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可以大体平均；包产到户一小二私，会出现两极分化。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将包产到户上升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不仅激烈批判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

由于这一时期农村和农民问题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除了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主题外，到1979年，在中国境

内有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基本停顿下来。

与国内研究的基本停滞相比,在这30年中,国外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倒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旅美华人杨庆坤根据自己20世纪50年代初在广州郊区鹭江村的调查写成的《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农村》(1959)。(2)威廉·韩丁根据他对人民公社时期陕西长弓村的调查,出版了《身翻:一个中国农村的继续革命》(1983)。(3)1975年~1978年,美国汉学家陈佩华(Anti Chan)、Jonahan Unger和Richard Madsen对广东陈村的研究,他们三人对26位流入香港的陈村知青和村民进行了223次深入访谈,撰写了《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国农民社区的现代史》(1984),Madsen还利用这次访谈的资料撰写了《一个中国村落的道德和权力》(1984)。这两本书对陈村的社会权力结构和干部权力的道德基础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此外,由于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对中国内地乡村的实证研究受到很大限制,一些西方学者如裴达礼、王斯福、马丁和帕斯特奈克等人,便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台湾和香港地区,对这些地区的乡村进行实证研究。1964年和1969年帕斯特奈克对台湾南部两个社区进行了调查,并于1972年出版了《两个中国村庄的血缘和社区》。英国人类学家华德在对一个香港渔村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出版了《多样化的意识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的改革开放 和第二次研究高潮的出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得以恢复

和发展,并形成了20世纪第二次研究高潮。这次高潮的出现是有其深刻背景的。首先,1978年开始发动的农村改革,揭开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帷幕。20多年来,我国农村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和农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包产到户,到乡镇企业,再到村民自治,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同时,此前在农村中潜伏和积累的各种问题、矛盾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也逐步显露出来,甚至激化,这些都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为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创造了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再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大量引入,为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广阔理论资源。在此情景下,在学术界和政府政策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形成了20世纪第二次研究高潮。

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学术关注点,这次高潮大致可以分为有机衔接的三个发展阶段:

1. 20世纪80年代早中期主要是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的农村经济研究

这一时期研究的主题多与1979年开始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关,许多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或积极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与呼,或是调查论证改革开放给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各种变化,论证政策合理性的色彩较浓。

2.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主要是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和人口流动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变革而进行的农村社会研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解决了生产动力问题,使生产